



扫描二维码
关注“上海社区发布”



扫描二维码
关注“i 五里”

五里桥

社区报

SHANGHAI COMMUNITY NEWS

自 / 家 / 门 / 口 / 这 / 点 / 事

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联合出版

五里桥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联合出版

上海众多居民区采用的“三会”制度 二十多年前就从这里起步

如何更有效地激发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活力、更有效地动员居民有序参与社区建设?上世纪 90 年代末,五里桥街道党工委率先在全市探索“三会”制度:即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对居民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由居委会主持召集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进行协商、讨论和监督,有效提升了基层民主自治水平。

为深入学习贯彻上海社区工作会议精神,近日,上海社会建设专家讲坛在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办事处举行,本次讲坛的主题是“推广‘三会’制度经验,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上海市民政局副局长曾群、黄浦区副区长左轶梅出席讲坛,并与上海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雄、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原副书记袁建国、《宣传通讯》主编田冰,一起向五里桥街道五位社区干部代表赠送了《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

上海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杨雄现场宣读了《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中关于“五里桥街道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探索‘三会’制度”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蓝皮书”是“两会”代表参政议政的参考资料,是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校和社会各界人士了解上海社会发展的专业文献,“三会”制度在新时代社区治理中的实践价值研究成果在《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发表,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五里桥街道党工委书记沈永兵做主旨演讲,沈永兵指出:经过 20 年的探索与实践,“三会”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成为了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站在新的历史条件起点,五里桥街道充分运用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把行政过程纳入协商民主范畴,一是坚持行政协商,高效破解社区治理顽疾;二是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行政协商的重大意义;三是对标更高标准,推进行政协商规范化建设。沈永兵表示,五



里桥街道将认真学习贯彻“上海社区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做优“三会”制度、做实行政协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上海市社会工作党委原副书记袁建国、《宣传通讯》主编田冰、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何海兵、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颖围绕“推广‘三会’制度经验,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作了专家点评演讲。

袁建国认为,“三会”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社区民主协商基因,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五里桥街道“三会”制度的实践经验,

为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提供了四点启示,即要坚持党的领导、要紧紧依靠群众、要注重民主协商、要突出共建共治共享。

田冰指出,“三会”制度作为一套基层民主协商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有效解决了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实现了基层社区有序、规范、精细治理,是城市社区治理的“中国之治”,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和实践价值。何海兵对市委《关于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谈了学习体会。

何海兵认为社区是城市运行的底盘,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党执政的基础,必须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何教授用“党建引领”“功能综合”“机制融合”“队伍增能”四个关键词来概括《意见》的主要精神内涵,并就深入贯彻《意见》、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三点思考与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的“红基石”工程,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的“新基建”工程,提升社区治理的数字化能力;三是进一步加强社区治理的体制优化工程,提升社区综合服务管理能力。

陈颖认为,“三会”制度在推进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表示华阳路街道将进一步学习借鉴“三会”制度经验,以深入学习贯彻上海社区工作会议精神为契机,深化新时代“凝聚力工程”建设,努力打造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着力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

五里桥街道紫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志祐作为社区干部代表,交流了推进“三会”制度的体会以及新时代继续深化“三会”制度的新思考。

据悉,“上海社会建设专家讲坛”是一个高端社会治理思想、理念和经验交流平台,是在上海市民政局支持和指导下由上海市社会建设研究会创办的社会治理智库平台,通过发挥研究会专家资源优势,定期从宏观与中观层面面对上海市社会建设的现实问题进行研讨交流,提炼总结基层治理成功经验,旨在为上海城市社会治理提供智力支持。

10多年违建 1 个月内拆除 高效背后的“三会”制度迭代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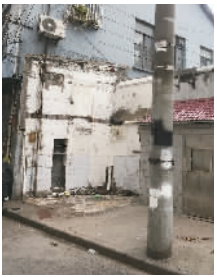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在解答“拆违”这道社区治理难题时寻到了一种更高效的方式。作为上海“三会”制度发源地,街道充分运用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拨开种种表象问题,直指居民核心需求。于是,一份拆违、屋顶修复相结合的实施方案,让居民们无法投出“反对票”,抵触情绪渐渐消融、顾虑也渐渐消失。就这样,存在 10 多年的违建在短短 1 个月内就顺利拆除。

在上海社会建设专家讲坛上,《上海社会发展报告(2020)》同步发布。黄浦区五里桥街道的“三会”制度探索案例被写入书中。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诞生起,“三会”制度正式步入 4.0 时代。当下的上海,正在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三会”制度如何



焕发新生成为一项新课题。

时间倒回至上世纪 90 年代末,那是单位制消解、社区制建立的社会大转型时期。对于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从未有过经验。黄浦区



五里桥街道,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全国首创了实现社区共治自治的“三会”制度——通过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让居民的事情,居民说得算。

在“三会”制度下,只有议题征询由党组织出面召集,其他大部分会议都由居委会出面召集,党组织起到引领支撑作用。一开始,居民们参与热情高,各种意见都愿意提。多次讨论后,他们也慢慢摸清了个中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是说,要在会议上讨论解决大多数人的事项。这其实正是社区治理最大公约数形成的过程,也是群众协商民主意识养成的过程。

在一次次热烈商讨中,更多人开始意识到,民主是有成本的。居民们通过“三会”制度自我教育、自觉承担在社区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并逐渐摸索得出如何办事成本最低,最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文汇报)